

# 海内之冠：国博藏北宋早期拓《集王圣教序》考正

李瑞振

**内容提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宋拓《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多本，其中最珍贵者，莫过于明人张应召旧藏的北宋早期拓本。从版本上来看，张彦生、王壮弘前辈均以碑文拓本中“纷纠所以”之“分”首笔“丿”画可见作为国博本《集王圣教序》版本最佳的依据，其说影响深远，然而依今日所见却失之偏颇甚至是错误的。从鉴藏来看，国博张应召本《集王圣教序》另有“人情如纸”等铃印，王壮弘等碑帖学家未曾释出，殊为遗憾。从装裱来看，长期以来，世人皆以国博此本为宋拓、宋装（王壮弘先生首倡此说），然而沈从文先生却另有不同说法。斯人虽去，学术未已，我们以最新视角辨析这些关键问题，以期为推动宋拓碑帖的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关键词：**《集王圣教序》 张应召 版本 铃印 装裱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明人张应召旧藏的《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为北宋早期拓本，其版本价值在海内外现存的宋拓本《集王圣教序》中首屈一指。

这本《集王圣教序》是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上海文物市场（上海古籍书店）征集购买的，此本帖身有虫蛀多处，曾略做修补。

## 一、缘起：发现“《圣教》之冠”

碑帖学家张彦生于1963年在《文物》第3期发表了《怀仁集王书〈圣教序〉拓本概述》一文，历数多种宋拓善本，其中对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这册张应召本《集王圣教序》推崇备至：

宋拓本中最突出的，要属中国历史博物馆由沪古籍书店收来的一本……此本沪人云为上海收购废书中所拣出。<sup>[1]</sup>

张彦生作为碑帖研究的大家，过眼善本不可胜数，其所提及的“此本沪人云为上海收购废书中所拣出”，这个“沪人”指的就是国博张应召本《集王圣教序》的发现者王壮弘先生。

王壮弘先生是现当代知名的太极拳武术家、版本学家、碑帖鉴定学家，曾先后任职于上海古籍书店、朵云轩书店等，从事文物征集工作。国博张应召本《集王圣教序》就是王壮弘先生在其任职

[1] 张彦生：《怀仁集王书〈圣教序〉拓本概述》，《文物》1963年第3期，第34页。

上海古籍书店期间直接发现的。<sup>[1]</sup>

王壮弘在多种学术著作中提到了其上海张家花园偶然发现这本《集王圣教序》的传奇经过。1985年,王壮弘先生出版《碑帖鉴别常识》,书中列举了十二则碑帖鉴别的实例。在“观碑欲细一则”中,王先生较为详细地记叙了国博张应召本《集王圣教序》的发现过程:

一九五八年于沪上张家花园一旧家观赏金石书画,见碑帖拓本一纸,垫于书堆之下,取而阅之乃《集王书圣教序记》残页。初不甚介意,及细察觉其拓墨精细,字画较一般宋拓为瘦劲,而精气内含,知决非凡物。求主人再搜寻数页,验其裱褙都为宋纸,字口墨法均属宋拓上乘,然其重要考据处皆不得见,于是偕同主人橱前、屋下、废书、杂纸堆中检索渐得,逐一校勘尚缺一页。而其考据非但“圣慈所被”之“慈”字丝毫未损,并文内六行“纷纠”之“纷”字“分”部,首笔赫然尚存,为现存《圣教》考据最高之本。无意中发现如此鸿宝,不禁为之狂喜。主人亦喜形于色。翌日主人复于锅盘下得面板二纸,内缺一页亦已寻得,竟成完璧,粘贴成册。<sup>[2]</sup>

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王壮弘先生在上海张家花园旧藏家的家中,无意间发现了几页《集王圣教序》拓本。当天,王先生和藏家一起找到了拓本的绝大多数内容,第二天,藏家主人又找到了拓本册页的面板和其中的剩余一页,可以说,这两天是改写宋拓《集王圣教序》研究历史的重要时刻!

王壮弘先生在《崇善楼笔记》中也提到了这册《集王圣教序》发现的过程<sup>[3]</sup>:

此册余得于上海张家花园旧家,适值北京八大馆建成(一九五九年),遂归中国历史博物馆……张本见于茂名路张家花园一旧家……今张本藏北京历史博物馆。<sup>[4]</sup>

在著作《艺林杂谈》中<sup>[5]</sup>,王壮弘先生又提到了此事:

唐拓既不可见,传世所见拓本当以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张应召旧藏、王际华跋本最为精旧,此册为宋装大开本,首尾无缺……为存世《圣教》诸本之冠,一九五八年笔者得于沪上张家花园一旧家。<sup>[6]</sup>

除了王壮弘先生以当事人的第一视角记叙了这本《集王圣教序》以外,朵云轩的工作人员从另

[1] 王壮弘先生1956年至1960年任职于上海古籍书店。参见王壮弘:《崇善楼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261页。

[2] 王壮弘:《碑帖鉴别常识》,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页。

[3] 20世纪80年代,《崇善楼笔记》在《书法研究》连载,后结集出版为专书。

[4] 王壮弘:《崇善楼笔记》,第152—154页。

[5] 20世纪80年代,王壮弘先生先是在《书法报》专栏写文章,名为《艺林杂谈》,后结集出版为同名专著。

[6] 王壮弘:《艺林杂谈》,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

一个角度记载了王壮弘等人发现这本《集王圣教序》的过程：

60年代初，现茂名路附近张家花园处的一户人家请朵云轩派员上门“会诊”，他家有一批前人留下来的碑帖。字画鉴定人员一一翻检，发现价值一般。正在此时，从纸堆里掉下两张残片，富有经验的鉴定员拣起一看，立即断定这是宋代拓片。原来这家人将这本珍贵的碑帖拆开来垫锅子用了，朵云轩鉴定人员发动这一家人翻箱倒柜，经过几天的搜寻，最后这件零片散佚的拓本，终于从灰蒙蒙的壁角里抢救出来，最后两页还是在灶头旁拾得的。经过精心装裱重现光彩。国庆10周年前夕，首都十大建筑落成，中国历史博物馆来上海筹集藏品，一眼相中了这部《宋拓王羲之圣教序》。后来该馆在报上公布了馆藏的十件珍品，这本碑帖荣幸地名列榜首。<sup>[1]</sup>

上述记载中提到发现碑帖一事发生在“60年代初”，显然不对，因为1959年此帖已经调往北京。另外，说此帖“精心装裱重现光彩”，亦言过其实，此帖散页经王壮弘先生发现后，用淡黄色老纸从散页背部进行简单拼接、黏合，“修旧如旧”，复成一册。

综合上述史料来看，这本张应召旧藏本北宋拓《集王圣教序》是王壮弘先生于1958年在上海茂名路的张家花园发现并且购得的。（图1）根据王先生的描述，在一个收藏者家中“书堆之下”偶然发现“《集王书圣教序记》残页”“拓本一纸”，细察之下，发现拓本“精气内含，知决非凡物”，于是和该处主人一起在“橱前、屋下、废书、杂纸堆”等处搜寻其他残页，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两天努力找寻，这册北宋拓《集王圣教序》被再次粘贴成册，复归完璧。



图1 国博张应召本北宋早期拓《集王圣教序》  
尺寸：高10cm，宽14.56cm 来源：国博馆藏

1958年，为迎接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北京市召开国庆工程动员大会，一千余名建筑工作者参与其间。第二年，即1959年，人民大会堂、北京火车站、农业展览馆、北京历史博物馆等首都十大建筑落成。作为展示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窗口，北京历史博物馆的收藏水平和陈列水平备受

[1] 严慈：《朵云轩史话》，吉林摄影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瞩目。由于北京历史博物馆“陈列品大多是来源记载不明的传世品，缺乏科学依据的实物”，“既不能全面地、确切地反映历史面貌，向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也不能满足他们参观的要求”，而“陈列内容的好坏，关系到外宾对我国历史的了解与政治影响”。<sup>[1]</sup>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关部门下发《请选拔出土文物以支持北京历史博物馆充实陈列》《为新建的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故宫博物院征集文物与资料》等文件，推动相关文物的征集工作。“在文物的征集工作中，全国各兄弟单位和一些同志发挥社会主义协作精神，把本单位或个人所收藏的许多重要文物支援历史博物馆。”<sup>[2]</sup>

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刚刚重现于世人面前的这本张应召旧藏北宋拓《集王圣教序》可谓适逢其会，加上王壮弘先生的大力推崇，这册碑帖遂成为当时文物征集的重点对象。最终，这册标价一千元珍贵拓本以一千五百元价格（沈从文先生说法）被征集到北京历史博物馆，成为后来中国国家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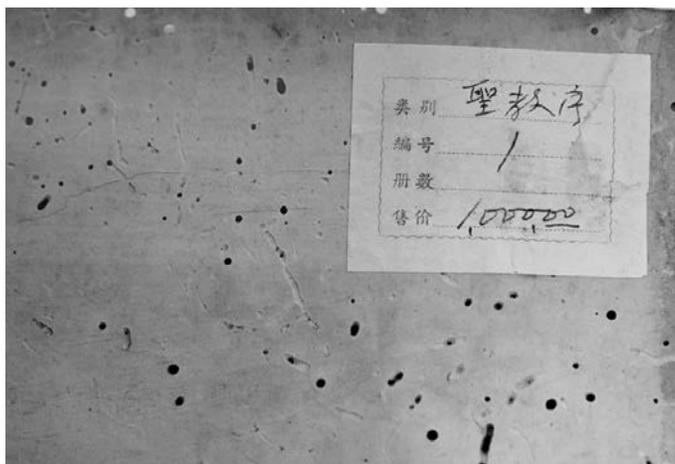


图2 国博张应召本《集王圣教序》裱褙所贴旧价签  
尺寸：高5cm，宽7.53cm 来源：国博馆藏

## 二、版本：误解“天下第一”

传世碑帖之中，若论宋拓本数量最夥者，莫过于《集王圣教序》和《九成宫醴泉铭》，其中以《集王圣教序》最为常见，仅中国国家博物馆就藏有北宋拓、南宋拓数本。除了传世众多的宋代拓本之外，甚至还有关于《集王圣教序》唐代拓本的历史记载。

清人王澐在《虚舟题跋》中收录了一则《唐僧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的题跋，其中谈到了《集王圣教序》唐代拓本的情况：

雍正六年，新建友人裘鲁青之任归安，过余九龙山斋，款语移日。道及《圣教序》云，曾见山东新城王氏所藏唐拓朱砂本，朱色鲜润，香气袭人，自首迄尾纤毫无缺。碑一册，跋三

[1] 李万万：《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筹建及展陈制度的成熟》，《文物天地》2016年第10期，第91页。

[2] 陈乔、史树青：《邓拓同志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廖沫沙等：《忆邓拓》，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5页。

册，重十数斤，盖是初刻成时进御者。非直《圣教》奇宝，亦是碑刻墨王。吾前以积书岩所藏为天下第一，闻此当退避三舍矣。惜未由见偿此饥渴。<sup>[1]</sup>

这则文献常为研究者所征引，也被视为关于唐拓《集王圣教序》的唯一著录文献来看待，实际并非如此，清人杨守敬也有相关记载：“昔吾友胡石、查义赞为言商城周氏有此碑（《集王圣教序》）朱拓本，如初刻成者，定为唐拓。”<sup>[2]</sup>由此可见，关于唐拓《集王圣教序》，非止一说。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唐拓《集王圣教序》，诸家均未亲见，皆为辗转听闻。由上述记载可知，传闻中的唐拓《集王圣教序》为朱拓本，而且字画未损，“自首迄尾纤毫无缺”，“盖是初刻成时进御者”。唐拓本固然珍贵，可惜并未有传世者，更无从辨别其真实情况。

由于唐拓本未见传世，宋代拓本的《集王圣教序》就成为存世可见的最早版本。

粗略统计现存的宋代拓《集王圣教序》，计有几十本之多，其中仅北宋拓本就有多种，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张应召本、宝熙旧藏本；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朱翼庵旧藏本、王铎题跋本；国家图书馆藏殷铁庵本；上海博物馆藏周文清本；上海图书馆藏翁方纲题跋本（亦为张应召旧藏本）；日本三井文库藏刘铁云本；天津博物馆藏崇恩“墨皇”本；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刘正宗本，四川博物馆藏郑板桥本，等等。上述这些都号称北宋拓本，是现存《集王圣教序》拓本中的翘楚。为求简明，兹将目前常见的几种北宋拓本《集王圣教序》列表如下。（表1）

表1 《集王圣教序》目前较为常见的几种北宋拓本

序号	拓本	装帧	概况	收藏地
1	国博张应召本	每半开6行；行10—11字	白麻纸拓；有王际华题跋	中国国家博物馆
2	宝熙旧藏本	每半开5行；行10—12字	后《心经》缺一开；有张效彬跋	中国国家博物馆
3	朱翼庵旧藏本	每半开4行；行9—10字	白麻纸拓；缺末行；有王世懋跋	故宫博物院
4	上图张应召本	每半开4行；行11—12字	明库装；有翁方纲、尹秉绶题跋	上海图书馆
5	刘铁云旧藏本	每半开5行；行10—12字	拓工佳；有董其昌、刘铁云跋	日本三井文库
6	刘正宗旧藏本	每半开5行；行11—12字	明库装；有董其昌、郭尚先跋	西安碑林博物馆
7	崇恩旧藏“墨皇”本	每半开4行；行9—10字	白麻纸拓；字口肥润；有崇恩跋	天津博物馆

《集王圣教序》北宋拓本的判断，主要依据几个字作为标志性考据点：碑文第十五行末尾“圣慈所被”之“慈”字完好，仅有一道斜裂细纹贯于字之右上，字画未损，而南宋拓本“慈”右上字画已损；二十一行“久植胜缘”之“缘”字左下不连石花，而南宋拓本已泐连下方石花。（表2）其他地方，北宋拓本与南宋拓本没有太大差异。北宋早期拓本字体瘦硬，字口锋利清晰，北宋晚期拓本字口不复泾渭分明，笔画边界已见朦胧之态，碑帖研究者谓拓本上此种笔画现象为“腴润”。

[1] （清）王澐著，李文点校：《虚舟题跋·竹云题跋》，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年版，第110页。

[2] （清）杨守敬著，杨先梅辑，刘信芳校注：《杨守敬题跋书信遗稿》，巴蜀书社1996年版，第87页。

表2 《集王圣教序》北宋与南宋拓本考据字差异对比<sup>[1]</sup>

北宋拓本	南宋拓本	北宋拓本	南宋拓本
			
北宋本“慈”字未损；南宋本“慈”字右上损泐明显		北宋本“缘”字下部不连石花；南宋本已损泐至与下方石花相连	

北宋诸拓本中，根据碑文拓本中“纷纭所以”之“纷”字右边“分”首笔“丿”画是否可见，又进一步分为北宋早期拓和北宋中晚期拓两种。符合北宋早期拓本特征的现今有三种，分别为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张应召旧藏本、宝熙旧藏本和故宫博物院所藏朱翼庵旧藏本。这三种拓本“纷纭所以”中的“纷”字右边“分”首笔“丿”画均清晰可见。（图3）



图3 张应召本（左） 尺寸：高8cm，宽4.82cm 来源：国博馆藏  
宝熙本（中） 尺寸：高8cm，宽4.13cm 来源：国博馆藏  
朱翼庵本（右） 尺寸：高8cm，宽3.86cm 来源：故宫官网

仅以“纷纭所以”处考据而论，这三种拓本几乎难分伯仲，加之其他重要考据皆合《集王圣教序》北宋拓本的特征，因此我们说，这三种拓本堪称当今北宋早期拓本的“标准件”。

1963年，张彦生在《怀仁集王书〈圣教序〉拓本概述》中将国博藏张应召本推为“天下第一”：

宋拓本中最突出者，要属中国历史博物馆由沪古籍书店收来的一本。此本与一般“慈”字

[1] 表中所选北宋拓本为国博藏张应召本；南宋拓本为西安碑林1973年发现的南宋（金）拓本。

不损本所异者。六行“纷纠”，“纷”字中笔可见，所见北宋拓本，此为第一。<sup>[1]</sup>

从中可知，张彦生将此拓本推为“天下第一”的主要依据是“纷纠所以”之“纷”字右边“分”首笔“丿”画可见（“丿”位于“纷”字中间，故张彦生称“纷”字中笔可见）。张氏作为近代碑帖版本研究大家，寓目拓本之富，可谓无出其右者，加之这篇论文发表于《文物》杂志，于是这一论断逐渐成为影响最大的说法。

1984年，张彦生在《善本碑帖录》“唐怀仁集王右军书三藏圣教序记”条目下，将国博张应召本推为其所见“最旧拓本”，与其前说无甚差异：

见比较最旧拓本，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乾隆时四库全书总裁王际华旧藏，并题字。宋装本，六行“纷纠”，“纷”字中笔可见，五行末“圣慈”，“慈”字首点无石花痕，“慈”字完好，其他与一班北宋拓“慈”字完好本无显著差别。<sup>[2]</sup>

1985年，王壮弘先生进一步丰富了张彦生的这一学说。在《崇善楼笔记》中，王壮弘将国博张应召本、宝熙本（即沈乙盦跋本）并列为最旧之拓本：

所见北宋本，以在上海张家花园收得之明张应召旧藏本，及北京沈乙盦跋本为最。文内六行“纷纠所以”之“纷”字“分”部首笔可见，“以”字右笔首末泐粗。碑裂纹仅及“文林朗”之“林”字，“尚书高阳县”之“书”字无裂纹。此二本今皆藏中国历史博物馆。<sup>[3]</sup>

这一认识可以说是在张彦生的基础上往前推进了一步，将国博张应召本、宝熙本并列为北宋早期拓本。

由于张彦生1963年发表的《怀仁集王书〈圣教序〉拓本概述》一文影响太大，以至于直至今天，中外学者依然难逃张氏论断的“禁锢”。2020年，意大利学者毕罗在《尊右军以翼圣教》一书中说道：

中国学术界经常把“张应召集王”称为“天下第一本”，原因在“分”和“以”与其他拓本相比更完整一些。<sup>[4]</sup>

如果将张彦生误解“天下第一本”《集王圣教序》归结于时代之局限，尚可体谅；那么今天的研究者还在继续这样的“误解”则值得我们反思，这也是我们今天详细辨析《集王圣教序》北宋早期拓本的现实意义。

[1] 张彦生：《怀仁集王书〈圣教序〉拓本概述》，第34页。

[2] 张彦生：《善本碑帖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3页。

[3] 王壮弘：《崇善楼笔记》，第148—149页。

[4] [意大利]毕罗：《尊右军以翼圣教》，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02页。

由上述国博张应召本、宝熙本和故宫朱翼庵本三者的“纷纠所以”对比来看，这三本皆符合张彦生所说的“最旧拓本”之特征，因此，这个考据不能作为国博张应召本“天下第一”的依据。应该说，国博张应召本、宝熙本和故宫朱翼庵本均属《集王圣教序》的北宋早期拓本，皆可称为张彦生所谓的“最旧拓本”。

那么，国博张应召旧藏本还是不是“天下第一本”呢？

评价碑帖版本的优劣，我们还有一个重要标准，那就是涂墨描补和内容的完整性。就这一点而言，国博张应召本仍可称“天下第一”。

拓本在拓完之后，常常被以墨笔描补，以求完美，然而这样一来，就很难反映拓本的真实年代，所以，描补行为实为古代拓本之“一厄”也。诚如民国收藏家方若在《鲜于氏离堆记残石拓本》题跋中所说：“樊氏藏本多墨描致伤，世人勿效此习，便是积德！”<sup>[1]</sup>由此可见墨描拓本之习气为大收藏家所不齿！

《集王圣教序》北宋诸拓本中，不乏墨笔描补者，如天津博物馆所藏“墨皇”本、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刘正宗本等，无论石花还是笔画处，均有不同程度的描补。正因为如此，故宫博物院的马子云先生亲自到天津目验“墨皇”本，发现其涂描之弊，实在不孚“墨皇”之名：

清代崇恩所藏《怀仁集王圣教序碑》，为之爱不释手，称为“墨皇本”。一九七九年春，我到天津艺术博物馆，对“墨皇本”详细审查一遍，得知此是北宋晚期拓本，拓工不精，装裱不佳，字过肥而失其原神，且“显”字已涂。“显”仅涂左竖笔，中缺左横笔，其中“丝”字起笔应连在“日”字之右，但是所涂偏左，下边之各笔皆较原刻，每笔皆毛草，而无笔划边际。现有北宋晚期拓本数本，皆拓工精细而字神好。“墨皇”之名，是崇恩自我抬高，名不副实。<sup>[2]</sup>

以这样严格的标准审视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张应召本和宝熙本原件，未见描补之痕迹，通篇神完气足；而故宫藏朱翼庵本则有几处明显描补，如“久植胜缘”下石花经过墨笔涂描。

值得注意的是，宝熙本和故宫朱翼庵本在内容上均不完整。（图4）其中，宝熙本的《心经》部分缺一开，计约117字；朱翼庵本末尾缺20字。此二本由装帧之形制观察，其拓本文字缺失均在最终装裱之前。反观国博张应召本，文字内容则十分完整。<sup>[3]</sup>

国家博物馆藏张应召本《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纷纠所以”，“纷”字右边“分”字首笔“丿”画清晰可见，通篇内容完整，未见墨笔描补之弊。综合来看，的确不负“《圣教》之冠”、天下第一的美名！

[1] 《鲜于氏离堆记残石拓本》册后方若题跋，国家博物馆藏本。

[2] 马子云：《碑帖鉴定浅说》，紫禁城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页。

[3] 国博张应召本第四开“幼怀贞敏，早悟三空之心；长契神情，先苞四忍之行”，由于装裱原因，错剪为“幼怀空之心长契神贞敏早悟三情先苞四忍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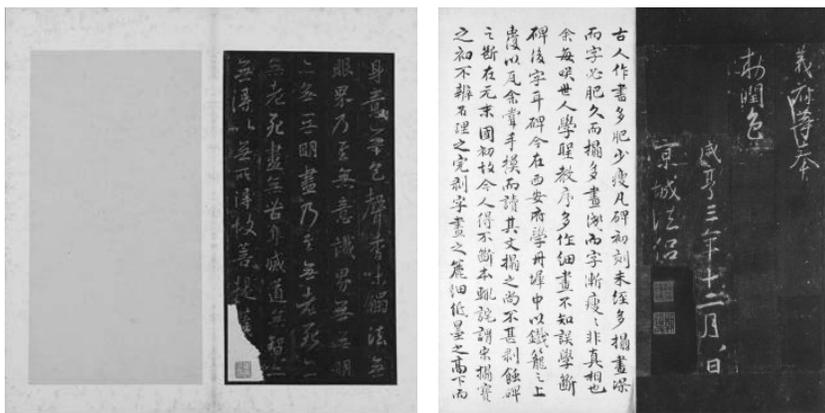


图4 宝熙本（左） 尺寸：高7cm，宽7.22cm 来源：国博馆藏  
朱翼庵本（右） 尺寸：高7cm，宽6.68cm 来源：故宫官网

### 三、鉴藏：错释“人情如纸”

国博张应召本《集王圣教序》，剪裱本，全本17开，其中帖心部分15.5开。裱本每半开纵40厘米、横26.3厘米；帖心纵30.5厘米、横18.1厘米。

综观国博张应召本《集王圣教序》的收藏情况，可见有收藏印章多处和题跋一处。其中，收藏印章基本为明代人张应召所钤盖；而题跋则为清代乾隆朝大臣王际华所书。通过这些内容的梳理，基本可以勾勒出国博张应召本《集王圣教序》在明清时期的递藏情况。

#### （一）在明代的流传

翻开国博张应召本《集王圣教序》，朱迹累累，每一开均有钤印，少则一枚，多则五枚。可见鉴赏者对此册拓本宝爱之甚。

前辈学者对此册所钤印章业已有所研究，但是有些印章的释文尚存争议。如王壮弘先生将其中三枚印章分别释为“□□”“谷芎”和“吴音忘听”：

每页右边均钤有□□骑缝印，及下“谷芎”小印，并有“吴音忘听”之双葫芦印。<sup>[1]</sup>

对于其中的“人情如纸”骑缝印，王先生将其误认为二字印，其印文释文作“□□”。

2014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百年收藏集粹》一书再次对王际华题跋本《集王圣教序》的收藏印章进行了注释：

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碑册，北宋拓本……钤印：张应召印、南唐张应召图书印、爱听吴音、谷芎等。<sup>[2]</sup>

[1] 王壮弘：《碑帖鉴别常识》，第89页。

[2] 吕章申主编：《中国国家博物馆百年收藏集粹》，安徽美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484页。

相比于王壮弘先生的印章释文,《中国国家博物馆百年收藏集粹》将“吴音忘听”释作“爱听吴音”,这一点较王壮弘先生所作释文有进步,双葫芦印的确应以《中国国家博物馆百年收藏集粹》释文“爱听吴音”为是。但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百年收藏集粹》对于“人情如纸”骑缝印亦从略未释;而对于第一开所钤“南唐张应召家藏图书印”,则误释为“南唐张应召图书印”,漏掉了其中的“家藏”二字。

综合王壮弘先生所作印章释文和《中国国家博物馆百年收藏集粹》书中钤印释文来看,除了“□□”骑缝印以外,其他钤印均已顺利释出。

我们通过对拓本所钤印迹原件上的三十多处同一钤印反复甄别,最终确认,前辈学者未能释出的“□□”骑缝印,并非二字印,实为四字朱文印章,印文作“人情如纸”。(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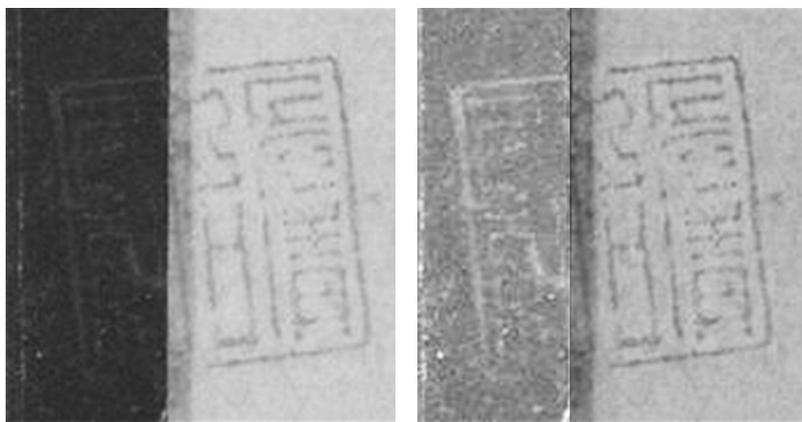


图5 国博张应召本“人情如纸”钤印原图(左)及印章图片处理后的效果(右)  
尺寸:高4cm,宽8.65cm 来源:国博馆藏

“人情如纸”朱文印在章法上设计得十分巧妙,四字印文作三列。第一列自上而下排布“人情”二字,其中“情”字又从左右结字分解为上下两结字,上边为“心”,下边为“青”;第二列是一个“如”字,也将“如”字从左右结字分解为上下结字,上边为“女”,下边为“口”;第三列为“纸”字,将“紙”字从左右结字分解为上下结字,上边为“氏”,下边为“糸”。

由“人情如纸”一印的字法和章法分析来看,篆印之人对篆刻章法十分熟悉且独具匠心。

经过统计,此册拓本合计钤印六十五处。其中,绝大多数为重复钤印,主要为“人情如纸”“爱听吴音”“谷芴”三枚朱文印,这三枚印章重复钤盖多达六十二处。

以上三印,多次重复钤盖于裱本之中,用印规律高度一致,其印主应为同一人。根据印文内容和用印特点来看,这三枚印章的主人就是明代张应召;而为张应召刻制印章之人则为其师温如玉。<sup>[1]</sup>

张应召,字用之,山东胶州人。明代后期著名的书画家,擅画山水、人物。同时也是石刻刻工,师事明代后期苏州刻工、篆刻家温如玉,二人最著名的活动就是共同完成了肃府本《淳化阁

[1] 我们通过对国博张应召本《集王圣教序》所钤印章和温如玉传世的篆刻作品来看,二者艺术风格高度一致。温如玉篆刻情况见高石:《温其如玉:吴门篆刻家温如玉篆刻艺术撷谈》,《吴门印风:明清篆刻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年版,第145—156页。

帖》的摹刻工作。温如玉、张应召师徒二人，主要工作都与碑刻有关，其中温如玉还特别擅长篆刻，其很多篆刻作品留存于《渠亭印选》。

温如玉，字白雪，别号伯坚。明长洲人。善真、草、行、篆、八分书，尤工印章，籍于胶，子孙居东乡温家庄……张应召，字用之，别号起莘，原籍陕西某县。善山水人物，尤工写真，师事伯坚。万历三十一年同应肃藩召摹淳化阁帖，凡十二年而成，亦籍于胶，子孙居东乡华家庄。<sup>[1]</sup>

张应召十分擅长碑刻钩摹之法，为时人所称道，而张氏摹勒碑刻所采用的“字典”正是《集王圣教序》：

予在北海，见胶西张用之为人集右军帖中字作碑，先用硬黄法摹帖中字，于纸向灯取影，以远近为大小，若今人为影戏者。度其式合，就而双钩，然后实填，故一帖中字大小能相似。<sup>[2]</sup>

从周亮工的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周亮工曾经在北海见到张应召在碑刻活动中使用集王羲之书法的字帖。与此对应，明天启六年（1626）六月，张应召曾为大臣李从心摹刻《奉天诰命帖》。（图6）此帖集王羲之书法而成，其中所用之字即从《集王圣教序》中辑出，从此帖中亦可见张应召对《集王圣教序》的掌握十分娴熟。由此可见，《集王圣教序》对张应召来说，不单是收藏品，同时也是他赖以工作的重要工具。

温如玉原籍苏州，“吴音”专指苏州地区的语言、语音。温如玉作为明代著名的刻工，与弟子张应召辗转多地，从事刻碑活动，师徒二人饱尝世味。张应召受此影响，不单“爱听吴音”，亦常感慨“人情如纸”，尽在情理之中。

除了以上三印之外，尚有张应召所用印章三枚。第一开右下角裱边处“爱听吴音”双葫芦印上方钤盖“南唐张应召家藏图书印”朱文方印一枚。第十六开右半开帖心左下角钤有“张应召印”朱文方印、“字用之”朱文方印各一枚。这三枚钤印均为张应召所使用。

全册拓本钤印情况统计如下。（表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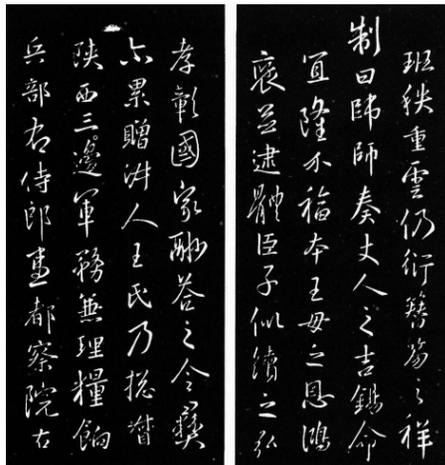


图6 张应召摹勒的集王羲之书《奉天诰命帖》  
尺寸：高8cm，宽7.74cm 来源：《藏帖浅识》

[1] （清）张同声修，（清）李图纂：《道光重修胶州志》卷三十，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刊本。

[2] （清）周亮工：《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39页。

表3 国博张应召本《集王圣教序》钤印汇总

印章	印文	形制	钤盖	位置
	人情如纸	朱文方印 (1.4cm × 1.4cm)	31处	每半开拓本右侧画心与裱边骑缝处
	爱听吴音	朱文双葫芦印	16处	每开页右半开右下角裱边处 <sup>[1]</sup>
	谷芑	朱文方印 (0.9cm × 0.9cm)	15处	帖心每开页右半开右下角
	南唐张应召 家藏图书印	朱文方印 (2.2cm × 2.2cm)	1处	第一开右下角裱边处
	张应召印	朱文方印 (2.8cm × 2.8cm)	1处	第十六开右半开帖心左下角
	字用之	朱文方印 (2.8cm × 2.8cm)	1处	第十六开右半开帖心左下角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基本可以判断这册拓本在明代的收藏者主要是张应召。

## (二) 在清代的流传

国博张应召本《集王圣教序》在清代的流传情况，我们主要通过清代乾隆时期王际华的册后题跋来梳理。第十七开页右半开有清人王际华于乾隆壬午（1762）七月既望所书题跋一则，行楷书；五行；七十七字。（图7）

在这个题跋中，王际华道出了这册《集王圣教序》在清代的流传经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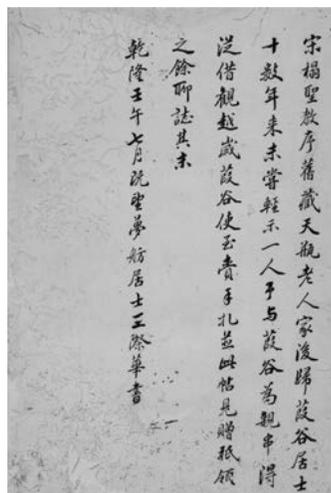


图7 国博张应召本册后王际华题跋  
尺寸：高8cm，宽3.82cm 来源：馆藏

[1] 前16枚“爱听吴音”钤盖于每开页右半开右下角裱边处，第17枚则钤盖于最后一开王际华题跋页的左下角，这最后一处钤印不仔细观察容易忽略。

宋拓《圣教序》，旧藏天瓶老人家，后归葭谷居士，十数年来，未尝轻示一人。予与葭谷为亲串，得从借观，越岁葭谷使至，贻手札并此帖见赠。祇领之余，聊志其末。乾隆壬午七月既望，梦舫居士王际华书。

据这则题跋可知，这册宋拓本《集王圣教序》曾先后经康乾时期的重臣“天瓶老人”张照、“葭谷居士”孔继涑以及“梦舫居士”王际华三人收藏，根据王际华题跋中“十数年”“越岁”“乾隆壬午”等时间节点，我们可以推论出，乾隆初年以前，此册拓本在张照处收藏。关于张照的书画收藏来源，既有皇帝赐予，也有其自身出钱购买得到。董其昌临《杨凝式新步虚词五首并跋》卷后有张照跋：

此卷曾为江邨先生收藏，不知何年落市儿手。雍正元年正月购得，卷首题签手迹宛然。照。<sup>[1]</sup>

至于具体到这本宋拓《集王圣教序》的来源，目前不得而知。

约乾隆六年（1741）至乾隆十六年（1751），此册拓本从张照处流传到孔继涑家；乾隆二十六年（1761），王际华从孔继涑处借到拓本；第二年即乾隆二十七年（1762），孔继涑将此拓本赠与王际华，王际华在收到这册拓本之余，于乾隆壬午（1762）七月写下册后之题跋，“聊志其末”。之所以发生这种流转，是因为张照、孔继涑和王际华这三个收藏者关系密切。

“天瓶老人”为清代书法家张照。张照（1691—1745），字得天，号泾南，亦号天瓶居士，江南娄县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葭谷居士”则为曲阜孔子后裔孔继涑。孔继涑（1726—1791），字信夫，号谷园，别号葭谷居士。山东曲阜人，六十八代衍圣公孔传铎第五子。

张照与孔继涑的关系很特殊。孔继涑的父亲曾经为儿子继涑求娶于张照之女，两家约定为儿女亲家，后张照之女未及成年而早亡，但是孔继涑一直与张照以翁婿关系保持往来。

乾隆三十八年（1773），孔继涑为张照的《天瓶斋书画题跋》作序跋，提到了孔、张两家的世代交往，情义非同寻常。

右《天瓶斋书画题跋》二卷，先外舅张文敏公所作也，昔先公为涑聘文敏公女，文敏答以董临《大仙帖》并铭端溪砚背见赐。涑时方小，未识其妙。稍长，笃好之，遂从文敏游，得少承指画。既而文敏下世，妙迹永绝。涑家无只字莫可临摹，遂从戚有之弃藏者假观，观必假归勒石以为永式……乾隆癸巳冬十月，子婿继涑拜跋。<sup>[2]</sup>

张照有一子两女，其中长女张应芝为其妻沈兰于雍正五年（1727）所生，曾许配给衍圣公孔传铎之子孔继涑，可惜张应芝六岁而殇。<sup>[3]</sup>

从孔继涑的序跋中可知，孔继涑的父亲曾经为其聘张照之女为妻，张照赠以董其昌临《大仙

[1] （明）董其昌：《杨凝式新步虚词五首并跋》，《玉虹楼续鉴真帖》卷十一，载《玉虹楼法帖》。

[2] 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八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版，第864页。

[3] （清）张汝璇、张廷柱等：《云间张氏族谱》，蔬香别墅藏本，清同治刊本。

帖》以及一方带铭端砚，其砚铭亦有记载：“玉亦待琢，圣亦待学。文其在兹，可以为错。雍正辛亥冬，赠豫哥贤婿。张照。”<sup>[1]</sup>

从张照赠给孔继涑的砚铭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这位未来女婿的期待和赞赏之情。稍长，孔继涑向张照学习书法，“曲阜孔谷园先生继涑刻《玉虹楼鉴真帖》数十卷。先生之书，瓣香天瓶居士，乾隆东巡，临书以进，上熟视曰：‘好像张照。’”<sup>[2]</sup>连熟知张照书法的乾隆皇帝都觉得孔继涑书法神似张照，可见孔继涑完美地继承了张照的书法技艺。

后来张照去世，孔继涑编订《玉虹楼法帖》，将张照的书法收入其中。

昨春，予再入京师，晤曲阜孔君葭谷，葭谷为文敏婿，盖亲见其悬臂作楷，而得真传者。文敏遗迹，葭谷既广为搜罗，钩勒上石。<sup>[3]</sup>

从上述《天瓶斋书画题跋》跋语中，我们也可以印证张照与葭谷居士孔继涑之间的密切交往，两人既有翁婿之情，又有师生之谊。张照曾经指点孔继涑学习书法。而张照去世后，孔继涑一方面将张照的书法摹刻收入《玉虹楼法帖》，流传久远；同时，孔继涑将张照的书画题跋尽心收罗，刊刻为《天瓶斋书画题跋》。

张照的藏品，既有生前赠与孔继涑者，亦有张照去世以后陆续归孔继涑所有者，其中也包括这册珍贵的宋拓本《集王圣教序》。

此册拓本归孔继涑所有后，因为孔与王际华也有亲戚关系，所以，乾隆二十六年（1761），王际华从孔继涑处借来拓本，观摩学习，不忍释手。过了一年，孔继涑派人给王际华带来书信，将此拓本一并赠与了王际华。

王际华（1717—1776），字秋瑞，一字秋水，号白斋，浙江钱塘人，清藏书家、书画家。乾隆十年（1745）一甲三名进士，历任工、刑、兵、户、吏诸部侍郎等。曾经参与《四库全书》的编纂，分别担任《四库全书》的总阅、总纂、总校、提调、协勘等。

在《集王圣教序》册后题跋中，王际华落款为“梦舫居士”。文献记载了王际华这个别号的由来。王际华在京为官，怀念家乡，忆起孩童时期的西溪小舫（一种船型建筑），形成了梦境，于是便将自己的书房仿造为西溪小舫，命名“梦舫”，并以“梦舫”自号：

乾隆庚寅，邸寓增构梦舫成。梦舫者，忆童时西溪小舫，形诸梦寐，因仿而为之，遂以名也。<sup>[4]</sup>

王际华，乾隆十年探花……初居韩家潭，后住外郎营的徐文穆宅。二十八年，将张廷玉、史贻直之赐第赐予王际华，将正堂起名为宝言堂，书室名梦舫。<sup>[5]</sup>

[1] 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八册，第864页。

[2] （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02页。

[3] 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八册，第864页。

[4] （清）吴荣光：《辛丑销夏记》卷二，清道光刻本。

[5] 赵雅丽：《晚清京师南城政治文化研究》，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56页。

这个“梦舫”，其旧址就在北京西城区前门外大栅栏地区西南的韩家胡同，原为韩家潭，1965年改为今天的韩家胡同。“宝言堂，在韩家潭，王文庄（际华）第，有梦舫室。”<sup>[1]</sup>

王际华的老家在浙江钱塘，距离上海不远，所以此册有可能由王际华从北京的“梦舫”带回老家浙江，直至1958年，王壮弘先生在上海重新发现此册。

#### 四、装裱：宋装、明装之争

碑帖拓本的装裱是裱本类碑帖拓本的重要组成部分，碑帖的装裱属于传统书画装裱的范畴。装裱堪称书画碑帖的命脉所系，“窃谓装潢者，书画之司命也……宝书画者，不可不究装潢。”<sup>[2]</sup>由此可见装裱对于书画碑帖的重要作用。也正因为如此，古人重视书画碑帖的装裱。

据记载，隋唐时期就有装裱者署名于书画之末的现象。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叙古今跋尾、押署”一节记载了诸多隋唐时期的装裱签署，如：“隋：江总、姚察、朱异、何妥。大业，年月日。奉敕装。”<sup>[3]</sup>“贞观十五年、十六年，月日，文林郎，臣张龙树装裱。”<sup>[4]</sup>证之以历史文物，敦煌藏经洞的唐代写经之上就已经出现了“装潢手解善集”“装潢手解集”“装潢经手王恭”“装潢手臣辅文开”等裱工署名的内容；至宋代，又出现了龙大渊、曾纯甫等装裱名工。清代厉鹗也说：“唐内府书画装潢匠，则有张龙树、王行直、王思忠、李仙丹辈，要皆良工好手。”<sup>[5]</sup>

然而可惜的是，“书画装裱发展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可是关于装裱理论的研究著作却是凤毛麟角”<sup>[6]</sup>。碑帖装裱理论的研究同样不充分，对于传统碑帖装裱历史的研究则更加贫瘠。由于缺乏传统书画装裱研究成果的支撑，历来碑帖研究注重版本，而于碑帖装裱的历史显得无力顾及。

关于国家博物馆所藏《集王圣教序》此册的装裱情况，相关研究显得相对充分一些，汇总起来有两种说法。王壮弘、张彦生等碑帖名家均认为是宋拓宋装。对中国古代服饰、织物深有研究的沈从文先生则认为并非宋装。

王壮弘先生说，征集此帖之时，已经散落的《集王圣教序》并不集中在一处，“求主人再搜寻数页，验其裱褙都为宋纸……翌日主人复于锅盘下得面板二纸，内缺一页亦已寻得，竟成完璧，粘贴成册……锦面和裱褙皆是宋时原装”<sup>[7]</sup>。王先生判断此册为宋代原装的依据是其装裱所用的覆褙纸皆为宋纸，同时“面板”二纸的锦面亦是宋锦原装。

张彦生在《善本碑帖录》中说：“唐怀仁集王右军书三藏圣教序记……见比较最旧拓本，藏中国历史博物馆，乾隆时四库全书总裁王际华旧藏，并题字。宋装本……”<sup>[8]</sup>张彦生在《怀仁集王书〈圣教序〉拓本概述》一文中亦称：“宋拓本中最突出的，要属中国历史博物馆由沪古籍书店收来

[1] 邓之诚著，邓珂点校：《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第362页。

[2] （明）周嘉胄著，尚莲霞编著：《装潢志》，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7页。

[3]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版，第50页。

[4]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第51页。

[5] （清）厉鹗撰，罗仲鼎、俞浣萍点校：《厉鹗集》（中），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617页。

[6] （明）周嘉胄著，尚莲霞编著：《装潢志》，第1页。

[7] 王壮弘：《碑帖鉴别常识》，第181页。

[8] 张彦生：《善本碑帖录》，第113页。

的一本。这本是宋装裱原册。”<sup>[1]</sup>

王壮弘、张彦生两大碑帖研究大家如此断言，似乎已经不必再讨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王壮弘、张彦生两位前辈专家并未言明或者详细申述更多的依据。曾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沈从文先生对王壮弘、张彦生“宋装”的说法并不买账，他认为此册不可能是宋代原装，而且从自己擅长的织物研究角度提出了具体的理由<sup>[2]</sup>：

例如我搞绸缎服装，馆中同志初即多以为是由个人兴趣出发，不是研究中必需的，不明白它用在许多方面，都有一定作用。直到我写出篇有关锦缎论文时，同行中才明白，这里面还有那么些问题，为从来写美术史的所不知。且就这一部门举几个小例，就可证明搞绸缎可不是什么个人兴趣了。一、本馆建馆时，派过两位同志去上海征集文物，花一千五百元买来一部商人担保是北宋原装原拓《圣教序》。这部帖据说还经由申博专家代为鉴定的。拿来一看，不必翻阅即可断定说的原装大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封面小花锦是18世纪中期典型锦，什么“担保”谎话，什么专家“权威”鉴定，若有了点锦缎常识，岂不是一下即推翻？<sup>[3]</sup>

沈先生质疑此册为宋代原装的主要理由是他认为此册宋拓《集王圣教序》封面小花锦是18世纪中期，也就是清康熙、乾隆时期的典型锦。宋锦，一般而言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宋代生产的织锦。宋代织锦传世和出土的极少，主要是一些宋装书画上面的装裱材料；其结构特点为用纬线表现花纹，属于纬锦。二是指明清时期由苏州、杭州、湖州生产的宋式锦，主要为苏州织锦。宋式锦按其结构特点主要为特结锦。这种锦在纬线显色的基础上，以单独经线对显色纬线进行局部固定，其技法起源于元代，至明清发展更盛。国博张应召本《集王圣教序》封面花锦从结构上看属于这种特结锦。（图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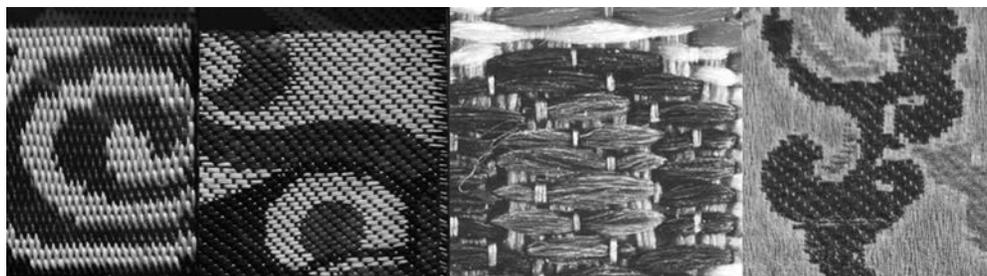


图8 经锦<sup>[4]</sup>（左）、纬锦（中左）、特结宋式锦（中右）和国博张应召本花锦（右）  
尺寸：高4cm，宽14.69cm 来源：国博馆藏

国博本花锦显蓝色纬线部分均有白色经线（蓝色上均匀分布的白点）进行固定，与特结宋式锦

[1] 张彦生：《怀仁集王书〈圣教序〉拓本概述》，第34页。

[2] 沈从文先生曾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文物研究，著有《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龙凤图案的应用和发展》《谈染纛》《蜀中锦》《江陵楚墓出土的丝织品》《明锦》等。

[3] 张新颖：《沈从文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9页。

[4] 经锦主要是通过纵列的经线显花，其发展时间较早，突出的代表就是汉代锦，如1995年10月新疆出土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膊就是经锦。

结构相同，而与经锦、纬锦（宋代锦结构）在结构上完全不同。

结合册内裱边处明代张应召铃印，我们认为，国博张应召本《集王圣教序》的装裱时间基本为明代，其表面花锦为明代所造特结锦。

实际上，真正的宋代织锦在清初就已经十分珍贵，难觅踪影。康熙年间，有人将明代收藏家季寓庸旧藏《淳化阁帖》面板所覆宋代织锦揭去，交由织坊，模拟花样，大受欢迎：

锦向以宋织为上。泰兴季先生，家藏《淳化阁帖》十帙，每帙悉以宋锦装其前后，锦之花纹二十种，各不相犯。先生歿后，家渐中落，欲货此帖，索价颇昂，遂无受者。独有一人以厚货得之，则揭取其锦二十片，货于吴中机坊为样，竟获重利。其帖另装他纹，复货于人，此亦不龟手之智也。今锦纹愈奇，可谓青出于蓝而青于蓝矣。<sup>[1]</sup>

“泰兴季先生”指的是明代收藏家季寓庸。季氏以曾藏《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和《伯远帖》而广为人知。

为了深化对国博张应召本《集王圣教序》装裱的认识，我们邀请古代丝织品方面的专家对这册《集王圣教序》的面板花锦进行了初步查看，基本认定为明清时期的宋式织锦。

装裱鉴定一直是碑帖鉴别的重要内容。对于碑帖装裱特别是“宋装”的探讨由来已久，清人孙承泽曾经在碑帖商人手中购得一册王羲之书《黄庭经》，并将其装裱鉴定为“宋装”：

乙酉之春，从市贾得宋装小册一函，展视，用笔之妙宛如手书，其墨色拓工俱绝。上书“御府古石刻”，盖唐石而宋装也……此帖诚不世之珍！每晨坐小窗下，旭光满室，开卷欣然，盖十五年于兹矣！<sup>[2]</sup>

那么，何为“宋装”？宋装一般指宋式装裱，是北宋宣和年间流行的书画装裱样式，又称“宣和装”，包括立轴、手卷等多种装裱方式，其用料、规制、尺寸等极为考究。至南宋时期，又出现了“绍兴御府书画式”，不但讲求工艺、材料等，同时在书画收藏制度等方面也多有发展。以宫廷书画装裱为代表的宋代装裱，蔚为大观，这是“宋装”的特定内涵。张彦生、王壮弘所说的“宋装”，显然并非这种典型的宋代宫廷装裱样式，而是指用宋代的纸张和织锦作为装裱材料的装裱样式。

此外，还有一则重要的文献材料，涉及张应召旧藏宋拓《集王圣教序》的装裱问题，那就是上海图书馆藏张应召旧藏《集王圣教序》册后的李守题跋。

除了国家博物馆所藏张应召旧藏《集王圣教序》拓本以外，上海图书馆也收藏有一册张应召旧藏《集王圣教序》，册后有明代人李守于崇祯十一年（1638）九月所书题跋一则，叙述了张应召收藏并转让其所藏《集王圣教序》的情形，读来十分生动。（图9）

[1] （清）褚人获：《坚瓠集·秘集》卷之五“宋锦”，《笔记小说大观》第15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第519页。

[2] （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85页。

胶西张用之，予于万历壬子岁识之京师姚氏。癸丑从先太史还里，别二十七年矣。秋七月，用之来游武林，还诣宋先之兵使者，便道款门，姓氏面目都不复识，历谈旧迹，始恍然如隔世，悲感久之。

用之出《圣教序》，视余鉴定，一装册，一尚全碑，碑圭形，丰下杀上。余夙闻之，字画细润，实前拓数十年。而装者之拓手特精，遂相伯仲。其精神纸墨，微独旧蓄，凡目所睹，悉无其敌，真可宝也。用之第愿割其一，而余皆不忍舍，因倒廉百石强售焉。

初以世少全碑，欲不复装，以存古迹。旋谓折处久当损字，仍与陆生某某加工为正本而藏之。自愧腕鬼过于奔洲，精鉴不如海岳，而留连淫滎之癖过之，亦甚伤于廉矣。崇禎戊寅九月，中庵记。<sup>[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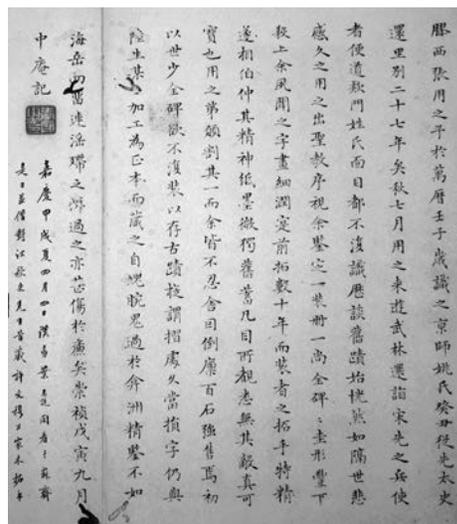


图9 上图本《集王圣教序》册后李守题跋 尺寸：高10cm，宽8.83cm 来源：上图馆藏

从李守的题跋中可知，崇禎十一年（1638）七月，张应召携带两本《集王圣教序》前往杭州，请李守鉴赏并最终将两种拓本转让于李。李守见到这两种拓本时，一本为装裱成册者，另一本则为全碑整拓未装裱者。这其中，成册者“拓手特精”，拓工精细；而另一本全碑整拓未装裱者“字画细润”，其版本比前者要早拓数十年。两者综合比较，可谓各擅胜场。李守担心未装裱的这一种整拓本时间长了难免折损，不好保存，所以就延请陆姓裱工为之装裱成册。也就是说，张应召旧藏全碑整拓本《集王圣教序》在崇禎十一年（1638）左右被后来的收藏者李守加工装裱。

对比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所收藏的这两本张应召旧藏《集王圣教序》，上图本拓工明显胜于国博本；但是国博本拓制时间要早于上图本。是不是说，上图本即为张应召出售给李守的装裱成册、拓工较好的那一本；而国博本则是李守于崇禎年间请陆姓裱工装裱成册、版本较胜者呢？<sup>[2]</sup>我们认为并非如此，因为国博本册内裱边处有张应召钤盖的多枚印章，这表明国博本在张应召收藏期间即已装裱成册，也就是说，国博本并非李守于崇禎十一年（1638）请陆姓裱工装裱的那一本。

国博张应召本《集王圣教序》面板织锦为明代的宋式锦，其拓本装裱时间不晚于张应召生活的嘉靖、万历年间。

综上所述，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张应召本北宋早期拓《集王圣教序》，其版本考据符合北宋早期拓本特征，同时卷帙完整，通篇无墨描之弊；历经明清两代递藏，渊源有序；其所存明代旧裱，古雅工致，堪为“海内《圣教》之冠”！

（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研究员，文献学博士，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

[1] 上海图书馆：《集王羲之书三藏圣教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0页。

[2] 仲威先生通过对比上图本和国博本的题跋和考据情况，对二者进行了考证。参见仲威：《〈集王羲之书三藏圣教序〉北宋拓本两种》，《书法》2012年第2期，第43—47页。